

马雅可夫斯基关于重演《钦差大臣》的演说①

杨伟民

作者赐稿

—

1927 年 1 月 3 日

〔笑声〕同志们，你们干吗哈哈大笑？请稍停片刻。

对艺术作品我已不再会表现出想当然的兴奋，并且对此而沾沾自喜。对艺术作品我只保留一个看法，这是对正干着这一事业的人的看法。然而此时此刻，我想放弃这一并不抽象，却有些冷漠的想法，原因在于我想旗帜鲜明地为这出戏辩护，为排演这出戏的梅耶荷德辩护。

我是抱有成见来看《钦差大臣》的，我是来骂《钦差大臣》的。因为报刊在骂，熟人们在骂，再加上我与《钦差大臣》又毫无特殊关系，所以很容易便会去附和报刊和熟人们的意见。由此可见，为了在日常生活中避免产生某些争执，最简单不过的办法是附和众人的意见。但是，我来看这出戏，两幕一演完，我便决定改变自己的观点，确切说，我从旁人那儿得来的对该戏的看法。目前还有一些反对意见，我们抛开个人因素不谈，专指在报刊上，在今天的研讨会上以及在家庭争论中提出的反对意见。

第一个反对意见是纯理论式的。我非常高兴，尊敬的来自罗斯托夫的教授为这出戏贴上了自己的学术标记。〔鼓掌〕这个反对意见是针对“自说自话”的。这个人看问题像是记录员：他巴不得说每句话都来编个号，上帝保佑，可别出差错。他有一本原著，于是就对照原著看戏，并能背熟。他要做的，也就是将原著和舞台上的

演出进行比较。如果两相一致就是好，他就会满意而归。他撰文、讲学不会有这方面的差错，于是他去继续过自己平静的生活，过那安宁而平稳的教授式生活。

正是剧本和舞台演出的这种吻合，对我、左翼文艺阵线成员即未来派来说，这不是优点，而是一个大大的缺点，戏剧恐怕会因此而完蛋。

超群绝伦的艺术作品在我们这儿并不多见。《钦差大臣》无论从文字本身、从作者提出的任务来看，无疑都属于我们现有的出类拔萃之作。但十分痛心的是，艺术上的辉煌巨作正日渐衰亡、腐朽、奄奄一息，它们已不能对观众再起什么作用，不能像作者在世时那样突现出来。有人出自种种原因为了鼓励已故作者而排演这出戏，而且使这出戏演得让死者不管满意不满意都会在棺材里翻几十次身，他的功劳也就非同小可了。我敢肯定，果戈理最初的抄本显得才气非凡，但这一初稿却并没流传到我们今天，因为这出戏是写给没文化的人看的（？）。当剧中有人说：信使，信使，三万五千名信使时，我一分钟都不想笑，就是笑，发出的也不是果戈理式的笑声，而是那位顿河罗斯托夫来的教授的笑声。我觉得，这出戏所有的价值在于导演的巧妙设计，对原作所进行的改动，用各种方法激活这出戏，使它以尖锐的讽刺剧形式、刺耳的直率性来表现，这正是果戈理已经赋予它的震撼人心的伟大之所在。

第一个问题：梅耶荷德是否扼杀了果戈理的笑声？或换一种提法：有没有这种笑？这不是问题，而是演出和原著的比较。于是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梅耶荷德是不是把《钦差大臣》改好了？这儿引申出必须对好几个地方要作清醒估计的问题。正如梅耶荷德所说，有些地方改动得非常精彩，即不是改动而是把原著精彩地展开了。

例如，关于在涅瓦河面上漂浮起一具女尸的一段话，赫列斯塔科夫开始瞎吹，说什么有些女人为他而自杀并漂浮了上来。①_但也有败笔，例如一只鹌鹑只值七百卢布，这句台词我毫无反应，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西瓜值七百卢布的说法了。显然，它被果戈理引用是为加强对比。然而鹌鹑毕竟价格昂贵些。15 名信使还不如 30 年前所说的 3.5 万名信使来得好。但现在说 3.5 万名信使又不如说 15 名来得好。多少名信使，保留原台词不变动，肯定不行。为此，我对这场演出的第一点异议也即在“教授式”方面，可归结为改动还太少，果戈理的原文变动不大。保留了鲍布钦斯基和陀布钦斯基，难道鲍布钦斯基和陀布钦斯基都是遥远过去的形象吗？难道我们现在就没有这种难舍难分的鲍布钦斯基和陀布钦斯基吗？难道格拉西莫夫不总是和基里洛夫走在一起？难道扎罗夫和乌特金不是非得成双成对地出出进进吗？①这是当代的鲍布钦斯基和陀布钦斯基。要是他能把这两人的名字改为扎罗金和乌特金，我一定会更欢迎。果戈理并非从姓名上而是从性格上来构思他们，也就不觉奇怪了。这也就是他们酷似活生生的人那样行动、交谈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是对这次上演果戈理作品的总意见：有没有上演《钦差大臣》的必要？我们和左翼艺术阵线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没有演出《钦差大臣》的必要。排它是谁的错？难道只是一个梅耶荷德？而马雅可夫斯基预支了稿酬，而剧本却没写出来，就没有错？我也有错。可是，安·卢那察尔斯基说“退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基身边去！”他难道没错？①那么是不是当有人谈起革新，大家都离场了，才意识到这是缺点，不能演这类戏呢？也许正因为大家都跑光了，其中隐藏有评判好戏的真正标准？我们留给革新的余地实

在太少了。我不是说所有戏剧都必须革新，也不是说应该排演那些大家都中途离场的戏剧。在导演个性、技巧都出色的情况下，有人离开剧场并不能说明演出水平，而只说明离场者的水平。该描述什么呢？不是去写某个人退场，而是要写离开的那位太可怜了。（鼓掌）关于演出方面，我有许多不喜欢之处，也有许多了不起的地方。有关了不起的地方，我可以举出例如咸鳕鱼那场戏。它给果戈理剧本增色 5%，这场戏也不可能不加进去，因为剧本中“鳕鱼”这个词是起作用的。也有很失败的地方：行贿一场戏，我怎么也无法接受，因为这儿应该渐渐增加：赫列斯塔科夫从一个人那儿取走一百，另一人那儿二百，到了第三个人那儿，他干脆伸出两只爪子赶快掳走了能拿的一切，可这时人们从各扇门里上场，台上乱成了一团。但这是一个革新问题，戏的平衡问题。

有人对我说，梅耶荷德没有照应该表现的去表现，因此我想回到梅耶荷德个人经历和他今天在戏剧界地位这一题目来谈。我不想把梅耶荷德支离破碎地呈现在你们面前。你们把《冒险家叶甫格拉夫》、《榆树下的爱情》硬塞给了我们，以此来作为梅耶荷德的代表作。我们应该清醒估计到苏维埃共和国的戏剧现状，我们有才华的人太少，许多都是埋在故纸堆里的人。我们有些人只要有地方能白吃夹肉面包，便最爱去参加别人的婚礼，对参加埋葬死者的事也同样乐意。这些葬礼和婚礼仪式早该进历史博物馆，代之而起的应是冷静的核算。

注解：

① 格拉西莫夫（1898—1939）；基里洛夫（1889—1943）；扎罗夫（1904—？）；乌特金（1903—1944），均为苏联诗人。

① 卢那察尔斯基在 1923 年 4 月 11 日和 12 日的《消息报》上发表题为《论奥斯特罗夫斯基以及有关他的几点意见》，文中提到“退回到奥斯特罗夫斯基身边去”，向他学习写作。

厦门大学图书馆